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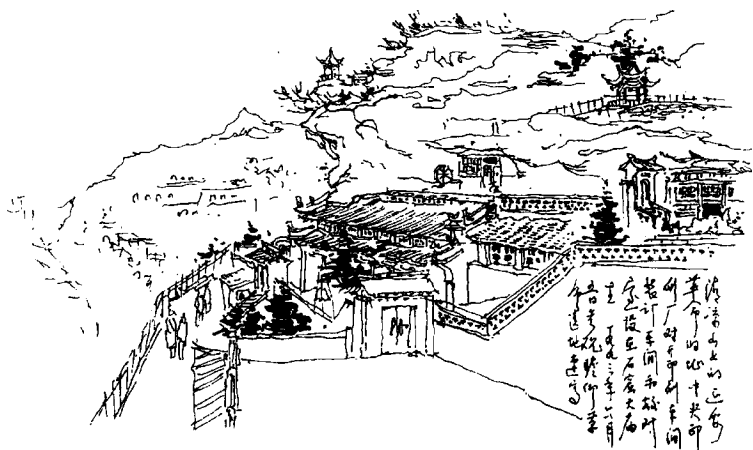
#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

( 1936 - 1947 )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是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出版工作的继续和发展。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出版工作与当时的政治风云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它以传播真理唤醒民众为己任，红星照耀中国，对全国的抗日和民主运动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陈毅同志有诗云，“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出版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如干部的交流，业务上的配合与协作，互相翻印出版物，不但有政治影响，而且国统区大后方有些革命出版物的原稿也是来自延安（如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丛书》为周扬、艾思奇在延安组稿编辑的，还有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也是这样）。这种互相促进的状况，不能不联系到大革

清凉山是指延安，指中共中央。延安的清凉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当年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那里建有“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



延安中央印刷厂旧址（速写）陆本瑞



延安新华书店旧址（速写）陆本瑞

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它创办的报刊和书店虽在国统区不能公开存在，但是党的出版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以各种方式出版书刊与反动派作思想文化斗争。另一方面，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就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出版报刊和书籍，建立起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基础。这两方面的斗争实践造就了一支从事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骨干队伍。所有这些积累和准备，为抗战后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大发展，以至建设新中国出版事业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延安作为革命文化中心，引导着革命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我国现代革命文化出版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根据现有资料梳理其发展轨迹，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革命文化出版传统，让延安精神万古流传。

### 一、延安成为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在我国长驱直入，使我国土沦丧，又加内战不休，民生涂炭，所以中国共产党呼吁团结御侮，挽救民族危亡，正合乎人民公意，是人民的共同追求和企盼。

1934年10月，党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行程25000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及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从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

1936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驻陕北根据地周边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与工农红军实现停战，共同抗日。而蒋介石却继续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亲临西安督阵，张、杨两将军犯颜劝谏，蒋不听，反而胁迫张、杨继续

“剿共”。由此引发 12月 12 日“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等）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积极工作，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反映了民族的觉醒，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抗日战争就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七七”全面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派出代表先后在国统区大后方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太原、长沙、韶关、桂林、贵阳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和各方面进行沟通，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党中央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为团结御侮鼓与呼的那份热忱和弘扬民族正气的精神境界，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戴和支持，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视延安为革命圣地。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讲话中说：“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地方，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延安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加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到延安学习，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延安荟萃了大批志士仁人、专家学者，共同致力于发展文教事业，成立了各个门类的学术文化研究会和社会团体，又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大学等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各方面的英才，造就中坚力量，以支持抗日和民主运动。

## 二、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区域发展出版事业的崭新道路

毛泽东到延安后说：“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

延安的出版事业是在大力推动革命文教建设中应运而生。如果没有革命文化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出版工作。出版活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开展文教工作的基础。“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任务”（见《张闻天选集》309页）毛主席除了指挥战争，极大地关注着新闻出版工作，并且亲自参与此项工作，因为这也是一条重要战线，文武两条战线一起抓。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的政治形势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联合抗日抗战的转变中。毛主席指出：“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培养干部，成为重要的一环。”这里有一个政治路线和围绕政治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转变问题。应使同志们明白了解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为了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传播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大后方去，要求重建党的新闻出版机构自有其紧迫感。因为显而易见，通过出版宣传，对引导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了对外宣传，“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见《论持久战》）

在延安发展出版事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能得到更多的请示报告的机会和可能。

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亲自执笔著书立说，各研究单位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出版物，其中有不少反映国家和民族学术、艺术水平的精神文化产品。在延安有不少学校，读者众多。单是能看书的干部就有一万多人，而且这些干部大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对他们来说，读书看报同吃饭一样都是生活的必需。

但搞出版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这方面在延安有局限性，主要是缺乏纸张和印刷条件。此外，还有一个交通运输问题。对此，党中央责成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努力创造和改善出版条件。党在延安的出版事业，经历了一个艰苦创业、从无到有、变弱为强的发展过程。

事实表明，党中央对全国的革命新闻出版工作是有全盘考虑和合理安排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行调整。如到达陕北后，首先复刊《斗争》杂志和《红色中华报》，继后，国共合作抗日开始了，便把《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1937年创办《解放》周刊，1941年变《新中华报》为《解放日报》；在国统区，1937年12月11日创建《群众》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新华日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延安以解放社名义出书的同时，在武汉设立中国出版社，重庆新华日报馆也出书，对桂林、香港的出版工作也有安排；随后又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和分局出版的机关报，其中还有《新华日报》华中版（苏皖边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晋绥边区）、《大众日报》（山东根据地）、《江淮日报》（华中根据地）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宣传网络，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以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广大群众，壮大革命队伍。

### 三、出版、印刷、发行事业机构的创建及发展沿革

#### 甲、组建编译出版机构

延安的出版事业机构，从党中央于 1936 年 5 月在瓦窑堡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1937 年 4 月创办党中央机关刊《解放》周刊起，到 1947 年 3 月党中央撤离延安为止的 12 年间，随工作发展和形势变化，几经调整，可分为三个时期，大致情况如下：

##### 1.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时期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博古）、吴亮平、李维汉、凯丰、陆定一、王稼祥等组成。张闻天任《解放》周刊主编，杨松、吴亮平（吴黎平）、陈昌浩任编辑（据《张闻天年谱》上卷 329 页记载）。毛齐华、廖承志、徐冰先后任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内设资料（出版）科、发行科，由黄植、涂国林分任科长。中央党报委员会对外的名称为解放周刊社，《解放》周刊用新华书局（二十期起改称新华书店）的名义发行。随后出书就用解放社这一名称。在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在汉口有一解放出版社，当事人声称为同人组织，与延安解放周刊社并无关系。不久该社宣告结束，所出版的“真理小丛书”六种，其中两种绝版（一为王明著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二为该社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另四种版权转让给新成立的扬子江出版社（见汉口新华日报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刊出的汉口解放出版社、扬子江出版社的启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此在 1938 年 2 月 4 日出版的《解放》周刊 31 期上面刊登有以下的声明：

“自民国廿七年三月八日起，凡关于本党文件，本党领导人之著作和言论，以及关于本党的历史材料及领导人传记等，均请托中国出版社及延安解放社印行。前此各书店所出版之与本党上述各问题有关之书籍小册等，除延安解放社出版者及曾经本党负

责人签字交付个别书局印行之个别小册子外，中共中央绝不负任何责任。”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司令部也有过同样的启事：

“近来市上发现各种关于本军过去及现在的小册子和书籍，以及关于本军负责人之著作言论或传记等，事先均未曾征求本军负责机关或负责人之同意和审阅。今特郑重声明，此后上述各类书籍小册等，本总司令部概委托中国出版社及延安解放社印行，其他书局前此及今后未得本总司令部或其负责人之同意所刊行之上述各类书籍小册等，本军概不负任何责任。”

这是为了防止在国民党统治区乱编乱印上述各类图书，以免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所采取的的必要措施。声明中所说的中国出版社设在汉口，由长江局领导（后面还要提到再加说明）。

解放社承担由马列学院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的出版任务。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于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张闻天兼任院长。该院设立了一个编译部从事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张闻天又兼编译部主任（张仲实1940年从新疆来延安后接任编译部主任），亲自抓此项工程。在院从事编译工作的，先后有王学文（副院长）、柯柏年、何锡麟、王实巍（王实味）、景林、赵飞克等人。此外，还有成仿吾、艾思奇、徐冰、吴黎平、陈昌浩等参与工作。所据版本，有俄文或德、英、法、日文本，也有一些是翻印国内已有的中译本和莫斯科出版的中文本，经校订后印行的。

党中央军委另设有编译处（后改编译局），从事翻译恩格斯等人和苏联的军事著作。叶剑英亲自指导，曾涌泉、曹汀、焦敏之等人从事翻译工作。军委总政设有八路军印刷厂，用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名义出版军事书籍，自成系统。

1942年毛泽东建议在整风后成立一个大编译部，大批翻译

马、恩、列、斯著作和苏联的书籍。他说：“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342 页）

到了 1943 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重新校阅当时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提高译文质量的决定。指定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负责。

经营出版，稿源是一个首要问题。解放社在编辑出版业务上，与在延安的各研究机关和文化团体之间在“集中指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下，配合协作，互动互助，是题中应有之义。

## 2.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时期

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人后方，创建了一批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敌伪顽反动势力，处于严酷战争环境中。正面战场上，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敌人的政治攻势下，汪精卫出走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当局怀有妥协投降图谋。1939 年 1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政治形势逆转，形成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局面。从此，国共之间出现了尖锐复杂的军事磨擦和思想政治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疯狂地压制破坏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一方面又动用托派分子、无耻文人编印名目繁多的反革命书刊，制造反革命舆论，推行其所谓“以数量胜质量”的反动计谋，混淆社会视听，迷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版发行任务，越来越显得重要，迫切需

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实有必要。

毛泽东于 1939 年 2 月 2 日，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发表了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扩大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成立发行部的重要讲话。同年 3 月 22 日党中央《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指出：“为了适当的散发、分配与推销党的各种出版物，统一对于各种发行机关的领导，打破各地顽固分子对于本党出版物的查禁与封锁 研究各种发行工作的经验”中央特决定：“从中央起到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必要时区委亦应设立发行部，支部委员会设发行干事，地委以上发行部除部长及必要的干事外，得依工作的需要 设立巡视员若干人”；“发行部下有必要时可成立发行委员会 吸收各种发行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各级党委应动员一批有发行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发行工作，并注意于培养此类发行工作的干部，不宜轻易调动他们的工作，以求得专门化与熟练”。这个文件，说明党中央对发行工作的重视。这在当年革命出版物的发行被敌顽封锁，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的情况下，对发行工作尤其有重要意义。许多发行工作者为发行革命书刊出生入死，党中央要求建立运输掩护部队，保证了发行工作的安全。

同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在不能设立铅字机时 即石印油印亦极重要”。“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和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会与读书会”。“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39年6月在筹建中共中央发行部的过程中，继而考虑到书、报、刊的编、印、发三环节相互衔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便于一元化领导，至9月正式宣布成立时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是以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出版科和发行科、中央印刷厂、党的交通组织和军队兵站作为现成的基础。组织上又先后从中央党校、组织部训练班、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抽调了一批过去做过发行工作的、有经验的人员充实这个机构。如过去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过的王矛（王世新）、卜明（卜兆麟）、周保昌、吴彬（范广楨）、叶文（殷益文）等人。原在中央党报委员会工作的徐明（徐可倬）也是较早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过的。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既是一个出版发行领导机关，又是一个出版发行工作部门。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兼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秘书长褚苏生。内设秘书处，处长褚苏生兼；出版处，处长孙萍、副处长臧剑秋；发行处，处长向叔保、副处长陈文宪、徐明；印刷处，处长祝志澄（兼中央印刷厂厂长）、副处长朱华民；总务处，处长臧晓真、副处长王越、卢积仑。

与此同时，把原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用以对外发行的名义上的新华书店，建成为单独建制的经营实体，隶属于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

### 3. 中共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央宣传部时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当局对陕甘宁边区重兵包围，经济封锁（对八路军不发粮，不发饷，不给枪械弹药，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不补助一分钱）。陕甘宁边区采取应对措施，除组织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联防，自力更生，大家动手，开荒种地，养活自己外，还实行了精兵简政，缩简机关编制，出版物也随之收缩。从1941年底起，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局，博古兼任局长，许之楨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内设出版科、发行科、指导科，由尹达、卜明、臧剑秋分任科长。书刊稿件由各编审机关负责，中共中央出版局掌管方针与计划。据《解放日报》1942年2月3日和12月31日所刊资料，1942年各单位报送的出版计划为7000万字，经出版局调整压缩为4000万字，年终完成3600万字。这个数字与印刷生产力相吻合。

1942年开始整风学习，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统一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宣传委员会成立后，原有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撤销。

1943年4月15日党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央出版局负责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中央宣传部负责统一审查全延安一般出版发行书报。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的正确原则是集中指导、分散经营。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出版方面的工作，由许之桢、张仲实处理。尹达、徐律先后负责出版工作，刘思让负责发行工作。到了1947年3月随党中央撤出延安告一段落。

## 乙、重建中央印刷厂

中央苏区在瑞金原有一个铅印厂，部分设备在长征中随军转移，后因为行军不便把它轻装坚壁了。红军在长征途中，宣传品都是誊写油印的。到达陕北之初，陕北根据地仅有两台石印机，忙于印各种票据。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党中央恢复出版《红色中华报》时，还是油印的（1937年9月从390期起改为铅印）。由于形势发展，为加强宣传工作，需要大量印制书报刊。1936

年冬，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央印刷厂，派随军长征到陕北的原瑞金中央印刷厂副厂长祝志澄（祝志澄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排字工人，大革命时参加过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1932年到江西苏区做出版印刷工作，1945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不止一次地到国统区，通过各种关系，物色聘请了一批印刷技术工人并采购了各种印刷设备和器材，连同合并青年印刷厂和自己制造的器材加在一起，计有对开平台印刷机五台，四开平台印刷机一台，圆盘印刷机、三色鲁林印刷机三台，铸字机三台，打纸型工具两套，铜模和铅字等。还有印厂工人樊允行创制成功的切纸机（工效比手工切纸提高了10倍），曹国兴制造的切书机（除刀片和几个螺栓为铁件外，全部是用榆木制作的，投产后，装订质量和工效都有提高，消灭了毛边书）。自制油墨也获得成功，由延长石油厂帮助烧油烟灰，兵工厂工程师沈鸿专为中央印刷厂制造手摇四滚压式油墨机，印厂工人蔡善卿、黄东生、沈泉等反复调试轧制成功。中央印刷厂自1937年4月起部分投入生产，7月1日正式成立。（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一度改称陕甘宁边区印刷厂，1941年以后，又复称中央印刷厂）

中央印刷厂的生产规模，1941年统计，每月排字在300万字以上（包括排俄文、英文、日文、朝鲜文等语种），分设报版书版、零件车间。每月正文印刷量折合全张纸约320令。生产条件是很困难的。如没有电力供应，印机用人摇动，后来想办法，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台汽车引擎改装来发电，用于牵动印机和夜间排字照明；有些字缺铜模用手刻，又缺打纸型的进口薄型纸，青工石新法以毛边纸代替使用居然成功，诸如此类，艰苦奋斗。中央印刷厂全盛时期，在册职工人数为260人。这样的生产规模，在当时的延安，可算是中型工厂了。

中央印刷厂历任厂长、副厂长：从1937年1月到1940年3月，厂长祝志澄、副厂长朱华民；1940年3月季长彬升任副厂

长。同年，祝志澄前往重庆购买印刷器材，返回延安后，接任解放日报社副秘书长兼经理，李长彬代理厂长。1942年李长彬调往晋察冀日报后，祝志澄继续担任厂长。1942年4月，杜延庆升任副厂长。1946年1月，祝志澄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万启盈接任厂长。此后，杜延庆调重庆新华日报社印刷厂工作，雷达天、黄东升、惠泽民等先后任副厂长。

毛主席关怀中央印刷厂，几次亲临印刷厂视察，慰勉有加。毛主席多次为中央印刷厂题词，如“艰苦奋斗”“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再接再厉，百折不挠”等。他把建好印刷厂看得比建几个师还重要。毛主席还参加过1939年印厂年终联欢晚会，有人站起来请毛主席唱歌，毛主席欣然应命，唱起“陕北好地方，小米加步枪，毛驴驮姑娘呀……”，如此风趣亲切，全场沸腾起来！

中央印刷厂职工们政治挂帅，意气风发，有厂歌一首，歌词照录如下：

是抗战文化的心房，  
我们的印刷厂。  
努力啊，弟兄们！  
加速转动我们的机轮，  
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声音，  
借着我们的印刷品，  
传播到四方。  
是抗战文化的心房，  
我们的印刷厂。  
努力啊，弟兄们！  
加速转动我们的机轮，  
让中共救国建国的主张，  
借着我们的印刷品，

散布全中国。  
努力啊，弟兄们！  
我们要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要创造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中央印刷厂曾设立过分厂，为的是预防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时，不致中断印报任务。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犯关中地区，加强了对边区的包围封锁，中央印刷厂于5-6月间，将近一半生产力迁往安塞县高家沟口建立分厂，职工40多人，分厂厂长李长彬，以印书刊为主要任务。至1940年5月，分厂撤销，迁回清凉山。

1942年4月，中央印刷厂奉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在杨家岭建立机要印刷厂。厂长由办公厅秘书处三科副科长王仲珊兼任，全厂不足20人，配备有四开印刷机、圆盘机各一台，小四号、老五号、小五号字架七副。主要为党中央重要会议排印文件之用。

1946年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吃紧。1947年初《解放日报》撤离延安，总厂随着迁至瓦窑堡附近，书报分厂分别设在子长县魏家岔、冯家岔。延安留下的分厂照常生产，但为时很短。印厂工人组成游击队转战陕北。至1948年毛主席东渡黄河前，才将中央印刷厂全部设备和一部分人员留给西北局，一部分人随新华社转移至华北。

中央印刷厂先后隶属于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出版局、中央宣传部，最后交给西北局。

这里，还应当谈到印刷纸张的供应问题。本来延安缺纸，主要靠外地供应。后来，筹建了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还有利华纸厂、宝丰纸厂、延园纸厂等，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选用当地野生的马兰草以土法造出了印刷报刊和图书急需的马兰纸，按印机

规格生产（32×23英寸大小，即对开纸尺寸），日出一万张。没有漂白粉，纸张保持原色。马兰纸的开发生产，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边区缺纸的紧张状况。谢老（谢觉哉）为诗赞曰：“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中央印刷厂印刷车间设在清凉山上万佛洞）但纸张的生产仍赶不上需要，出版书报刊不得不采取压缩的措施，这也是当时延安出版工作难以摆脱的困难。

#### 四、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出版活动

延安的出版工作，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开展起来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有其鲜明的战斗方向，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民族的方向，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立。它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作为自己发展的养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科学的方向，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对传统方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不搞民族虚无主义。大众的方向，就是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占人口90%以上的劳苦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步成为他们的文化。

延安的出版物，包括报刊和图书等几种形式。报刊的出版方面，首要任务是出好党报党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阐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它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推进抗日和民主运动，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主要有《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和《军政杂志》等。再就是安排好为组织和教育群众而出版的诸如《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以及各种文艺刊物等等，共有20多种。

图书出版方面，把马列主义著作、党的领导人著作以及党的历史文献等的出版列为首要任务。配合党中央号召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有助于确立它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中国革命的实践，迫切需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 1921 年 9 月，就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传》、《共产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资本论入门》、《国家与革命》等数十种。配合当时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提到自己世界观和政治信念的确立时说，有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见 1999 年 3 月 9 日《人民日报》黄新《养成浓厚的理论兴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接受革命理论，而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虽陆续编印了一些马列著作，但限于环境，没有大量流通的可能。到了党中央驻在延安的历史时期，才具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宣传科学真理的条件，当时出有《马恩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书。除了出版经典原著，根据实际需要，还编选了像《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供专门学习之用。这是我国出版马列主义著作空前繁荣的时期。

党的领导人著作、党的政策文件及历史文献的出版，有的放矢，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延安文